

互联网语境下的文化记忆与国家认同*

黄卫星¹, 张玉能²

(1.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 数字内容技术与服务研究中心, 北京 100190; 2. 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9)

摘要:国家认同是一个人作为主体对国家身份、民族身份、国族身份的一种认知意识、归属感和价值判断。它与人们的文化记忆是密切相关的。在各种不同的社会实践、思想观念等影响下,人们在各自不同的政治信念、国家观念、文化价值的框架和标准下,产生对国家认同的一套认知、情感和行为的心理结构和价值体系,并将国家认同和个人认同不自觉地进行融合,相互参照。在互联网语境下,每一个人的文化记忆都会更加广泛深入地影响到人们的国家认同。在开放的互联网下,丰富、多元、无边界的文化记忆,也就使得国家认同变得更加具有选择性、挑战性、复杂性;在互动性的互联网下,互补性、矛盾性、融合性的文化记忆,也使得国家认同产生了互助性、对立性、融通性;在多媒体互联网下,立体性、联觉性、逼真性的文化记忆,也形成了国家认同的多重性、情感性、理智性。在全球化冲击主权边界和文化身份的“危机”下,我们应该积极规避互联网的消极性,充分发挥互联网的优势,在新中国文化记忆的土壤中,高度统一起全国人民的个人认同感和国家认同感,以增强现代国家意识,促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关键词:互联网;文化记忆;国家认同

中图分类号:G112;G206.3;D647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8.02.0003

一、文化记忆与国家认同

国家认同(National Identity)是一个政治概念,又称国族认同、民族认同,是主体对国家身份、民族身份、国族身份的一种认知意识、归属感和价值判断。无论国家认同的主体是否具有法律层面上的公民身份地位,只要是将该国家、民族或者国族的传统、文化、语言和政治作为影响自身的凝聚性整体观念,并对自身思想、观念和行为发生重要影响的,便享有该国家认同(国族认同、民族认同)。例如,生活在海外的华人,在法律地位上已经不具备中国公民的身份,但这不妨碍海外华人以中国作为自己的国族认同。国家认同并非天生就有的生物特质,而是后天建构的社会性质,是一

种社会主体长期在日常生活中直接或间接接触到的共同元素,例如:环境、血统、历史、语言、风俗、教育、文化、艺术、宗教、价值观、日常生活方式、习惯等等,而共同建构起来的认同感。在各种不同的社会实践、思想观念等影响下,人们在各自不同的政治信念、国家观念、文化价值的框架和标准下,产生认同一定国家的一套认知、情感和行为的心理结构和价值体系,并将国家认同和个人认同不自觉地进行融合,相互参照:一方面,国家认同融入到个人认同内,即对于自身所属国族认同者会将国族信念和价值视为是正确的、对自身有意义的,并将在日常生活中实践这些信念和价值;另一方面,个人认同辐射到国家认同中,即自身认同者会将个人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作为出发点和评估标准,从而维系自身与国家、民族和国族

收稿日期:2017-10-10

作者简介:黄卫星(1974—),女,湖北蕲春人,中国科学院自动化所副教授,美国杜克大学访问学者,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文学博士,新闻与传播学博士后,主要从事文化传播、文化软实力、文化科技等方向的研究;

张玉能(1943—),男,湖北武汉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美学、西方美学、西方文论、文艺学等研究。

* 基金项目:国家基金项目“互联网时代的集体记忆与国家认同研究”(15BXW061)

之间的情感亲疏,并且建立对该国家、民族和国族的价值认知和价值判断。

“国家认同”与“国家”观念及其历史变迁,密切相关。什么是国家?西方现代学术界对现代国家层面上的“国家”界定的内核是“nation”(以某个特定的民族族群为基本单元)。1648年,在德意志的威斯特伐利亚地区,数十个欧洲国家及神圣罗马帝国诸邦国签署了一系列条约,借以结束它们之间的常年征战。这些条约后来被统称为《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它被认为是民族国家的开端,也是“现代”国际体系建立的标志,并且还留下了建立现代国家的几项基本政治原则,包括确立国家的主权地位,各国之间关系平等,宗教自主,互不干涉内政等等。主权/民族国家的兴起,使得本已摇摇欲坠的欧洲“道统”(教权和皇权)更加显得不重要了,教皇或者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不再是国家认同的参照系,各国自身的主体性空前强化。基于这种“民族国家”的逻辑的延伸,美国区域研究的领军人物、汉学家白鲁恂(Lucian Pye)对中国论断为:“中国不是一个民族国家体系内的国族。中国是一个佯装成国家的文明(China is not just another nation-state in the family of nations. China is a civilization pretending to be a state)。”中国果真只是一个文明体系而不是国家吗?确切地说,无论从历史发生的角度还是逻辑推理的角度,难道国家只有民族国家这种发轫于现代西方并且予以定义的形态吗?

我们首先回顾与“民族国家”意识兴起的同一时期的17世纪的东亚。虽然“中华”参照系模糊了,但“天下”秩序还在,并不断纳入新内容。“天道”“天命”这些不但受儒学世界崇奉、也受内陆草原世界信仰的观念,统合了东亚区域。在和域外交往中,“中国”作为多族群单一国家的身份逐渐清晰,不但首先以平等条约方式划清了与俄罗斯的边界,而且以宗藩原则与朝鲜、越南等定界。区域内国家的主体意识也都相应强化。区域秩序中,还加入了条约、自由贸易等外在于传统宗藩礼制的内容。^[1]世界历史演进中,“国家”的存在不仅只有主权/民族国家这一种形态。因此,我们很赞同学者宋念申的观点,他认为与其用短暂的欧洲“现代”标准测量中国或东亚乃至西方国家,不如探讨它们各自演化的历史要素和动力。“现代”不应是一个由某个特定的文化特征和历史轨迹按照它们既有的历史和规律来设定的方向和规制的性质,或者用某一种单一的看待历史的方法来对各

个不同历史面貌的国家进行“削足适履”。究其实际,“现代”本身是多元的,而不是欧洲规制的某种现代,事实上,不同“现代”之间的相互影响也远大于它们之间的相互排斥。

回看今天的中国,正如历史学家许倬云所言,“在今天东亚的中国地区,长久以来并没有形成西方‘民族国家’的观念,也就是说,政治共同体是一个天下性的大结构,在这个‘天下’的下层,才有各种其他的区块。”而华夏/中国却是一个“天下帝国”,葛兆光说,“就是到了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华夏/中国’仍不得不承袭大清王朝疆域、族群、文化方面的遗产。”^[2]显然,如果非要套用一个限定领土、族群与国民,尤其是族群与民族的西方现代“国家”的概念来思考“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特点,肯定是牛头不对马嘴,因为华夏、中国的历史就是多民族交往、迁移、融合乃至纷争的历史,正如许倬云、葛兆光等学者直言,“中国/华夏”的历史太长,线头太多,国家形成过程曲折迂回、族群地域的分合又重叠复沓。许倬云认为“归根结底它仍然是由此族与彼族、国人与野人逐渐混融才形成的共同体”。^[2]当代学人如果硬要照搬西方现代民族国家的概念来进行民族主义的线性叙事,那么造成的最直接、非理性的负面影响是——“不论是汉民族主义或是别的民族主义,都取消了历史的多元互动。受其影响,历史研究很容易成为当代政治的敏感点,造成涉边疆、民族、外交等话题的研究遇到很多限制和困难。”^[1]分裂主义和民粹主义乃至恐怖主义也会以此不成熟、不完善的学术结论作为政治实践的合法性。

因此,何为“华夏”,何为“中国”,这些概念的界定和讨论,既关乎国家合法性,也关乎历史合理性,是一个兼容历史、政治的双话题。葛兆光对许倬云《华夏论述》一书解说时,开篇提出:什么是“华夏”?什么是“中国”?讨论这一问题,既可以从今溯古,来论证国家合法性,也可以从古到今,以理解历史合理性;它可以是一个政治话题,也可以是一个历史话题;它可能惹出民族(国家)主义情感,也可能培养世界(普遍)主义理性。葛兆光并且指出,在涉及“国家”、“民族”和“认同”的时候,“历史”就开始像双刃剑,“论述”的分寸显得相当微妙,关键在于史家以什么立场、取什么角度、用什么方法。^[2]在数千年的历史中,我们往往习惯用“华夏”来替代“中国”这一概念,当这两个术语作为同一概念时,我们非常赞同著名历史学家许倬云在其《华夏论述》一文中所强调的:“华夏/中

国”是一个复杂共同体,这个共同体犹如“飞鸟无影”、“轮不辗地”,不可能是定格的。数千年血脉杂糅、族群相融、文化交错而形成的共同体,其认同基础不一定是国界(国界会变动)、不一定是族群(族群是生物学判断),甚至也不一定是语言或文化(语言文化也在变)。许倬云在其《华夏论述》一书中纵观中国古代历史——经过夏商周三代长期与连续地融合,中原文化将四周的族群和文化吸纳进来。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中原文化拓展到黄淮江汉,形成一个以中原文化为核心的文化共同体。到秦汉时代,“天下”格局不断吸收和消化外来文化,终于奠定了“中国共同体”。虽然数百年中古时期,中国共同体经历变乱,南北分裂,外族进入,但包括匈奴、鲜卑、氐、羌、羯等各个族群,但是仍在中古时代的中国共同体中实现了“人种大融合”。到了唐代,则以没有疆域性质却具有文化想象性质的“天下”理念和格局,又一次开启了“中国共同体”。

简而言之,关于“中国”的国家概念,我们似乎应该多层次地加以理解:“中国”应该有“地理中国”“制度中国”“文化中国”等不同层次含义。有学者说:“如果说传说中的禹是国土化中国的开辟者,那么周公就是制度化中国的创立者,而孔子则是文化中国的奠基者。只要文化中国还在,国土丢了,可以恢复,制度垮了,可以重建。不是所有的战争都带来统一,可只要文化中国在,无论怎样的乱战之势都会趋于统一;不是所有的异族入侵都能被驱逐,可只要文化中国还在,异族统治者早晚要被同化,国权终将被收复。直到明亡之后,顾炎武还在说‘亡国可以’,可‘忘天下’不行,天下是什么?就是文化中国。”^[3]因此,文化中国是国家认同的根本基础,而文化中国是存在于每一个炎黄子孙、华夏儿女、中华后裔的文化记忆中的集体记忆,甚至已经积淀为每一个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表现在一系列中国神话、中国汉字、中国仪式、中国图画、中国宗教、中国礼乐、中国诗歌、中国戏曲、中国音乐、中国习俗、中国服饰等等符号中的文化记忆。每一个中国人的国家认同,除了地理乡土、历史朝代以外,更加根本的就是文化中国及其文化记忆。

文化记忆既是个体记忆的集合汇聚,也可以是集体记忆的个人化叙述。历史由史实和叙事构成,既作为记忆表象又作为记忆叙述的文化记忆,未尝不是中国文化史这一宏大叙事的历史长河中的朵朵富有鲜活生命的浪花。从这个意义上说,

与国家认同有关联的文化记忆就是一部国家文化史。历史学家葛兆光对文化记忆和文化史之间的关系深有体会,他曾经阅读法国学者让·皮埃尔·里乌(Jean-Pierre Rioux)和让·弗朗索瓦·西里内利(Jean-Francois Sirinelli)主编的《法国文化史》,深感此书对“法国如何成为法国”这一问题,有着清晰的解析,“一个群体居住的领土,一份共同回忆的遗产,一座可供共同分享的象征和形象的宝库,一些相似的风俗,是怎样经由共同的教育逐渐形成的一个国家的文化”,这对于认识一个国家的历史和文化是相当重要的前提。^[4]^[72-85]一个民族或者一个国家的民众的文化记忆,是认识一个国家的历史和文化的重要前提。葛兆光直接提出:“在我看来,一部中国文化史固然是叙述中国的文化(包括族群、宗教、语言、习俗、地域)如何在历史中形成与流变(Being and Becoming),但也需要叙述这些原本散漫复杂的文化(包括族群、宗教、语言、习俗、地域),究竟是如何逐渐汇流并形塑出一个叫做‘中国’或者‘华夏’的国家来的。”^[2]文化记忆既有私人叙事的日常生活细节,也指向宏大叙事的民族国家想象。在民族国家想象中,关乎“国家认同”的文化记忆便自然成为了民族国家想象画卷中的坚硬内核,它沟通了民族国家想象的价值基础和核心内容。

在此,我们所说的“国家认同”这一概念,特指1949年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现代国家范畴下的国体和对象。虽然新中国是中国历史上乃至世界历史上一个全新的、独一无二、不可复制的国家,但是其实质仍然隶属国内外学术界所界定的“现代国家”范畴。

中华人民共和国从1949年建国至今,先后历经“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抗美援朝战争”“农业合作化运动”“手工业、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批判胡适资产阶级学说思想”“反右派运动”“反右倾机会主义”“大炼钢铁”“大跃进运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改革开放”“文化热”等活动或运动;又先后进入“市场经济”“消费文化”“互联网”“社交媒体”的时代和社会;同时存在着“文化多样性”和“民族主义”、中国的“特色主义”和“普遍主义”之间的悖论和张力。以互联网为主要传播媒介的当代,加之“中国梦”蓝图的召唤,网络传播充溢和飘扬着不少堪称典型的文化记忆,许多文化记忆关乎“新中国”的国家认同。这里所说的文化记忆中的文

化对象属于1949年伊始的新中国历史,但是记忆在当下互联网时代而呈现。即文化记忆的主体同时站在新中国历史与现实中国之间,自觉或者不自觉地从现实对国家认同度和认同情况出发或者受到现实的影响,去再现和想象那发生在新中国历史上的、已经过去的文化对象和文化现象。我们的互联网时代下的文化记忆与国家认同研究,就是要揭示两者如何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且相互建构——新中国的文化记忆的框架如何影响着对新中国的认同?新中国的国家认同状况影响又是怎样作用于文化记忆的形成、书写或呈现?

二、互联网语境中的丰富性文化记忆与复杂性国家认同

在开放的互联网语境下,人们面对了一个虚拟的仿象世界,信息量变得空前巨大,而且来自四面八方,五花八门,无边无沿,因此,人类的文化记忆变得更加丰富、多元、无边界,从而给人们认识过去的历史和自己的身份认同(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等)提供了更加充分的档案材料或者历史依据。也就使得国家认同变得更加具有选择性、挑战性、复杂性。

关于一个国家、民族、国族的文化记忆的信息,在互联网上既多又杂,人们必须选择那些与国家认同相关的,特别是那些有利于自己的国家、民族、国族身份认同的信息,来形成、确立、巩固自己的某种国家认同感,这就是国家认同的选择性、挑战性、复杂性。这种国家认同的选择性、挑战性、复杂性,对于一个经历了太多的苦难、曲折、奋斗、坎坷的中国人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必要的。我们且不说新中国建立以前漫长的封建社会和近百年以来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所历经的战火纷飞、哀鸿遍野、民不聊生、尸骨满地,强敌入侵、国土沦陷、奸淫烧杀、背井离乡的悲惨历史给中国人民留下的文化记忆。即使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所经历的艰难曲折,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给人们留下的精神创伤,同样是在每一个中国人的脑海中,在许许多多的物质符号和精神符号中,特别是文学艺术的作品中,刻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痕迹。这些文化记忆通过互联网储存、传播,给每一个中国人的国家认同提供着大量丰富多彩、形形色色、驳杂混沌、是非难辨的信息,需要人们进行分辨选

择,给人们国家认同带来了极大的挑战性、复杂性。而这种国家认同的选择性、挑战性、复杂性,并非绝对客观或绝对中立的,它们必然涉及选择者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因此,当一个人要依靠互联网上的文化记忆信息来决定自己的国家认同时,就必须选择与新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相符合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来对待互联网上的丰富、多元、无边界的文化记忆信息,分辨主流和支流,划清必然和偶然,本质和现象,从复杂多元的文化记忆的信息中,选择符合历史发展潮流、具有历史必然性、揭示了历史本质的信息,接受一些残酷事实的挑战,认清历史真相,以正确进行国家认同,做一个促进历史发展,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深明大义,明辨是非,高瞻远瞩,胸怀宽广的中国人。

比如,关于新中国成立以后土地改革运动的文化记忆,目前在互联网上就呈现出丰富、多元、无界限的状态。除了一些正面叙述土地改革运动的历史记述、口述历史以外,也有许多揭露土地改革运动中左倾言行、过激行动、暴烈行为等等的记忆文章、图片、小说等等信息。在新浪博客中就可以看到:不先生博客《土改运动中受难的地主女眷》《采访土改中民兵连长李朝庚参与轮奸地主女儿》《民兵轮奸地主女儿致死,至今无人受到审判》《土改分地主的杀地主的,这是不是土匪行为》《土改中被逼叛变投傅将军的陈怀初》等等。实际上,土地改革运动,从经济基础上彻底摧毁了地主阶级,同时也削弱了富农阶级。没收或征收的土地、财产全部分给了贫雇农和部分下中农,使农民所得到的土地占到总面积的95%,基本上满足了农民对土地的要求。之后又通过土改后期的复查运动,对错划成分的中农以及对某些地主照顾过多或打击过分的偏向作了纠正,从而确立了政策界线,极大地孤立了地主阶级,争取和团结了中农。土地改革真正实现了中国农民数千年来得到土地的奋斗目标,使农民真正从经济上翻身作了主人,从而最深入、最广泛地调动了农民群众的革命和建设的积极性,使农业生产力量获得了极大的解放。土地改革还确立了贫雇农在农村中的优势地位,巩固了工农联盟,为引导亿万农民走上集体化道路创造了条件。^[6]美国学者易劳逸在他的《毁灭的种子:战争与革命中的国民党中国》中写道:“国民党在农村的失败是由于当局——无能力保证农民的土地、安全和食物——极大地削弱了农民对政府所持有的尊敬。这就意味着政府正失

去合法性。沉重的经常性的苛捐杂税、腐败、绝大部分官员所显示出来的倾向地主阶级反对佃农的偏见,所有这些都削弱了政府的权威及其合法行动的社会价值。结果,农民们不是非难,就是躲避征税和征兵官员。”“与之相比,在共产党地区,可能大多数农民仍然是完全不关心政治的,但他们倾向于与这个政权合作。一些人,尤其是青年人,则积极地支持共产党人。”^[6]这恰恰是对土地改革运动意义的一个旁解。《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关于土地改革运动作了这样的评说:“作为一项经济改革方案,土地改革成功地把43%的中国耕地重新分配给约60%的农村人口。贫农大大地增加了他们的财产,但是实际上中农获益最大,因为他们最初具有更有力的地位。土地改革对总的农业生产力的贡献究竟有多大,这个问题仍可以争论。总之,这个运动的主要成就是政治上的。旧社会的精英被剥夺了经济财产,其中有的人被杀,作为一个阶级,他们已受到羞辱。决定性的事实是,旧秩序已经证明毫无力量,农民现在可以满怀信心地支持新制度。氏族、宗庙和秘密会社等旧的村组织已被新的组织代替,承担了它们的教育、调解和经济职能。从贫农和中农队伍中产生了新的村干部精英,这些贫农和中农的眼界已被中共的有阶级倾向的观点扩展了。”^{[6]78}这些论述和评论应该是基本上合乎事实的。还有像如何对待地主的问题,也是互联网上议论得比较多的问题。说起地主,人们一般自然容易联想到四个人:小说《半夜鸡叫》中的周扒皮、歌剧《白毛女》中的黄世仁、泥塑《收租院》中的刘文彩、芭蕾舞剧和电影《红色娘子军》中的南霸天。这是当年艺术作品塑造出来的四个典型的地主形象,也是多数中国人关于地主的最深刻的文化记忆。准确地说,这四个艺术形象应当称之为恶霸地主,并且是集恶霸地主罪恶之大成者。实际上,恶霸与地主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按照1950年8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规定,恶霸是指“依靠或组成一种反动势力,称霸一方,为了私人的利益,经常用暴力和权势去欺压与掠夺人民,造成人民生命财产之重大损失,查有实据者。”^[7]恶霸尤其是恶霸地主最为农民所痛恨,但恶霸并非都是地主,地主也不是人人都是恶霸,那种同时具有地主和恶霸两种身份者,便是通常讲的恶霸地主。全国的地主总数中可称为恶霸地主者毕竟是少数,据当年的调查,一般只占地主的十分之一。从阶级属性看,地主是剥削阶级,这些人

在土地改革运动中之所以被划为地主,主要是因为利用自己所占有的土地,对农民进行剥削。但是,作为每一个体的地主,作为个体的人,他们的品行是恶还是善,人品是好还是坏,是各不相同的。有的地主可能一方面通过出租土地剥削农民,另一方面又将其剥削所得的一部分用于社会公益与乡村慈善事业,做些铺道路、办学堂之类的善事。也有的地主为非作歹、欺男霸女、鱼肉乡邻,成为恶霸地主。农民也并非清一色,当中也有少量好逸恶劳、偷鸡摸狗之类的“二流子”。但从阶级总体上看,因为地主占有土地,可以凭借土地过着不劳而获的生活;而贫雇农由于缺少土地或根本没有土地,不得不租种地主的土地而接受地主的剥削,所以地主和贫雇农之间构成了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形成了根本的阶级对立,土地改革的根本目的就是要解决这种阶级矛盾。还应该看到,有的地主可能原本就是普通农民,由于某种机缘和个人努力,慢慢积累了一些财富,购进了若干土地,随着土地的增多自己耕种不了,便将土地出租给其他农民以收取地租。当地租剥削达到一定量的时候,这样的农民也就演变为地主了。对于这个现象,毛泽东1930年进行寻乌调查时就已经作了剖析。当时农民与地主的身份并非固定不变的,地主如果破产,就有可能变成贫农乃至雇农,普通农民也有可能由于“力作致富”或“由小商业致富”而上升为地主。当一个农民一旦成为地主,其本人也可能仍参加劳动,也可能仍过着勤俭的生活,但其必定将土地出租给农民以收取地租从而带有剥削性质,其阶级身份也就从普通劳动者演变成剥削阶级的一员,阶级属性根本变化了。^[5]因此,从阶级属性的总体上来看,地主是土地改革运动的革命对象,而对于每一个具体的地主,应该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并加以区别对待。当然在全国各地新中国成立以后土地改革运动中也确实存在着过激行为、左倾政策,甚至在某些地区涉及面还相当大,而在土地改革运动以后,对待地主、地主家属、子女也存在着比较多的问题,有的还相当严重。但是,这些相关的文化记忆,对于地主、地主家属、地主子女每一个人来说无疑是真实的,甚至是受到了极大的损害和委屈,但是,如果从土地改革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进程的大方向和主潮流来看,还是应该进行甄别和选择,这种甄别和选择对于具体的每一个人来说,无疑是具有极大的挑战性的,甚至是非常痛苦的,然而历史洪流滚滚向前,无法重新

审判,更无法倒退,那就需要大家正确对待那些关于土地改革运动的文化记忆。我们可以看到,大多数海外华人,还有许多出身于地主家庭的干部、知识分子,土地改革运动确实给他们留下了许多不堪回首的痛苦记忆、心灵创伤,但是,在新中国不断前进的过程中,他们接受了严峻的挑战,在艰难的境遇中,选择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认同:这些海外华人、华侨,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回到大陆,认祖归宗;而绝大多数出身于地主家庭的干部、知识分子,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选择了认同社会主义中国。这种正确的选择应该得到充分肯定和大力赞扬,以更加有力地推动全球华人的家国认同,而不应该以那些真实的“血海深仇”的文化记忆来颠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认同,尤其是港澳台地区的青年一代更加应该严格接受挑战,在互联网复杂的文化记忆信息面前,做出有利于中华民族大团结,促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选择。

三、互联网语境中的融合性文化记忆与融通性国家认同

互联网的互动性可以在网络互动中产生文化记忆的互补性、矛盾性、融合性的效应。它可以使得文化记忆在与用户(读者)的互补操作之中变得更加生动具体;它还可以使得文化记忆在互动之中通过矛盾性的异延而变得更加特色鲜明;它又能够使得文化记忆在互动之中变得融会贯通。经过互联网的互动性操作处理的文化记忆,就会变得活灵活现,本质还原,动态呈现,从而让人们以这种经过互补性、矛盾性、融合性效应处理的文化记忆来认同自己的民族和国家,达到刻骨铭心、不忘初心、矢志不移的价值效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继续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任务,进一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这本身就是一个史无前例的伟大历史创举,尽管前面有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和教训可以借鉴,但是,中国国情毕竟不同于苏联,有着自身的不同情况,于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只有在实践中摸索着前进,因而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许多巨大的挫折和失败,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有些甚至是血泪的代价。这些在人们的文化记忆中也就不避免地会反映出来,而每一个人所处的地位和情况也不完全相同,他们的

经历、修养、文化程度、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也不尽相同,所以每一个人所发布出来的文化记忆就会差异很大,甚至出现截然相反的对立,这些不同的文化记忆也会产生碰撞,在一定的舆论引导下,这些不同的文化记忆会形成某种互补或对立,最终大部分也就可能产生不同程度的融合,从而在复杂的情况下形成人们的融通性国家认同。实际上,经过了这种碰撞的互补性、矛盾性、融合性的文化记忆所形成的互助性、对立性、融通性的国家认同,才是真正具体生动、深刻广泛、融会贯通的国家认同,它才可能真正达到融通、巩固、持久的效应,从而实际有效地实现民族大融通、国家大团结、天下一家亲的国家认同感。

比如,关于1953—1956年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简称“三大改造”),在互联网上就有明显不同的意见。对于三大改造本身的具体评价,大致有以下几种类型: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七十年》的评价:“从方向和路线上来看,对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毕竟是符合于客观需要的,完成这些改造是一件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事情”^[8];同时指出三大改造存在着“四过”,即“要求过急、改变过快、工作过粗、形式过于单一”的缺点。以薛暮桥的《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文为代表,刘国光、林蕴晖等人评价为:50年代党提出在工业化的同时逐步开展对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正确的,但是这应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1955年掀起的以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为目标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建立的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则不符合当时中国国情,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第三种观点认为:三大改造从根本上讲是搞错了,在当时生产力水平条件下,不应该消灭个体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还有的文章谈到,由于总体上忽略了个体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改造的本质差异,从而缩小了社会主义改造,尤其是小生产改造的内涵,从而导致了工业化主体地位的否定。还有的著作比较邓小平与毛泽东关于这个问题的看法,认为他们是“根本不同的”。毛泽东认为,经过“三大改造”,我们就在一个经济落后的东方大国内建立了马克思所预想的高级社会主义,因而,三大改造是应当予以充分肯定的,这“恰恰表明了,毛泽东这时已陷入了新空想主义的泥潭”,邓小平则“只是肯定了‘三大改造’的短期效应,同时否定了‘三大改造’的长期效应。”^[9]

一些新中国成立以后留在大陆的民族资本家,比如荣毅仁、徐令娴等人,作为“三大改造”的当事人以自身的亲身经历充分肯定了它。吴琪的《60年十大经济事件解密:三大改造时期的资本家》记载:继1950年开国大土改后,1953年,中央全面开始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数亿农民来不及细品刚刚分田立命的喜悦,便投身农业合作化的大潮之中;手工业则第一次不再由单个手艺人独自传承、发展,一些千年工艺因而趋于鼎盛;而当年那些积极响应公私合营的“红色资本家”,如荣毅仁等,他们的命运沉浮更是见证了那段轰轰烈烈的历史。徐令娴的父亲徐美峰是南京中国水泥厂的经理,南京工商界的重要人物之一,因产业庞大、为人威望高而被称为“南京的刘靖基”。他在上海高安路的家人住在1948年刚刚搬进的大花园洋房里,这座四层高的建筑相当时尚,院子里有荷花池,一楼有酒吧,二楼玻璃花房,四楼有个100多平方米的健身房。做水泥生意的徐美峰从南京运来最好的水泥,窗户的铜和铁全是英国名牌,木地板用侧面拼接,因此厚度有好几寸,十分耐磨。浴室里的进口大理石浴缸,能够充分满足徐家人“全是又大又胖的身形”。解放军一进城,如今88岁的徐令娴向本刊记者回忆说:“不恐慌是不可能的,若是个穷光蛋也就无所谓了。”有产阶级不知道自己将面临怎样的命运。从徐家出来,穿过高安路小学的弄堂,就来到荣毅仁家的公馆——康平路71号,荣毅仁的姐姐荣漱仁则住在不远处的高安路18弄。徐汇区的这一带核心地段,聚集了工商界的不少名流。新中国成立后因为工商界的各种活动,徐令娴成了荣家的朋友。这一段时间,徐令娴告诉本刊记者:“共产党来了,资本家的生活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国家安定人民齐心,因此解放时留下来的资本家感到十分满足。”徐家在高安路的花园洋房,成了上海市政府接待外宾的一个“样板房”,每当有国外的高级官员前来访问,上海市统战部部长领导便会来徐家细致地检查一遍,“乒乓球拍更换新的,荷花池的水弄干净些”。外宾来之前,徐令娴便脱下列宁装,换上最好的衣料做的旗袍,从高级饭店订来饭菜招待外宾。外宾们谈话的主题无一例外的是:“你们资本家怎么会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徐令娴用自己展示出来的生活给外宾最好的回答^[10]。

当然,一场全国性的大规模群众性运动,肯定是复杂多样的,人们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

主义改造”的文化记忆自然也就是互补的、对立的,而只有这些互补、对立的记忆汇合在一起才能够真实构成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成为融会贯通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口述史、档案史、符号史。据网上材料披露:央视法治频道主持人劳春燕曾回忆,她的外公世代从医,在绍兴上大路开了一家药房,叫“致大药栈”。新中国成立前,致大药栈在绍兴城里也算数一数二的大药房了。新中国成立后公私合营,外公从药店老板变成了一名普通的药店信,也被命令去改造,和其他改造对象一起住在绍兴城里唯一的一座教堂里,每天挑河泥。年幼的妈妈去给他送饭,发现他的腿都肿了,一掐一个小坑,原来是得了浮肿病。一些公私合营的资本家,意识到工商业改造已是大势所趋。也有一些人开始对前途感到茫然,终日惶惶不安,顾虑重重,心甘情愿把家产献出来的毕竟是少数。有的资本家是“白天敲锣打鼓,晚上痛哭流涕”;有的说“多年心血,一朝付之东流;几声锣鼓,断送家财万贯。”^[11]网上有一篇博客转帖《请看阶级斗争年代民族资本家的小姐如何度过!》记录了上海永安公司(后来改为上海中百十店,现在的华联商厦)郭老板的四小姐黛西的回忆故事:50年代以后,一次次的运动,戴西从一个锦衣玉食有房有车的富家女,被剥离到住进7平米的亭子间,每月只有24元的工资。“晴天时,有阳光会从屋顶的破洞里射进来。而有北方寒流到来的早上,她醒来时,常常发现自己的脸上结着冰霜。”而每月24元的收入里,她要为儿子的大学生活费每月交纳15元,再扣去每月3元的交通月票费,她实际的生活费只剩下6元。她不吃早饭,在食堂吃最便宜的午餐。晚餐就是8分钱一碗的阳春面。这么艰难的生活,90年代戴西提起时,“她轻轻地吸了一下鼻子,好像在回忆一朵最香的玫瑰一样,她说:它曾那么香,那些绿色的小葱漂浮在清汤上,热乎乎的一大碗。我总是全部吃光了,再坐一会儿,店堂里在冬天很暖和。然后再回到我的小屋子里去。”1963年,她被送到青浦乡下的劳改地接受改造。她住的是原来的鸭棚。这段生活,她在自己的回忆录里这样写道:“先把稻草铺在烂泥地上,然后,我们把铺盖铺在稻草上。到了早上,身下的东西全都湿了,我们不得不把它们统统拿到外面去晒。当时,我们八个女人住一个小棚子,挤得连翻身也不能,晚上一翻身,就把旁边的人吵醒了。我们的乡下厕所靠近一条小溪流。刚去的时候,我问别

人到哪里去拿水刷牙洗脸，他们告诉我像村里的人一样，到溪流那里去取水用。我拿着牙具到河岸上，我看到人们在河边上洗衣服，有人在那里洗菜，让我大吃一惊的是，还有人在上游洗着他们的木头马桶！所以在开始的三天，我没有刷牙洗脸。后来有人告诉我，我们每天喝的水也是从那条河里打上来的，不过放了一些明矾在里面消毒。”从前她是一个大百货商的四小姐，她的生活是优渥的。可是，有一天，当生活夺走了她拥有过的一切，在贫民窟的煤球炉上，她还可以用铁丝在煤火上烤出恰到火候的金黄的土司面包来，她也可以用被煤烟熏得乌黑的铝锅蒸出彼得堡风味的蛋糕来，虽然没有烤得那么香。她被改造得十足就是一个布衣女。她甚至比一般的布衣女经历了更多艰难可怕和困苦的事。但最终当她端正地坐在桌前，文雅地喝着红茶，雪白的卷发上散发着洗发液的沁香，她所表现出来的教养里，依然有一种芳香的、精致的、对生活微小而纯正的坚持^[12]。这样的社会主义改造对于一个曾经养尊处优的小姐来说，无疑是非常痛苦的，但是，她最终接受了残酷的现实，把自己改造成为自食其力、吃苦耐劳的劳动人民。这其中有着惊人的痛苦和磨难，也有刻骨铭心的心灵创伤，但是，更有一种转变的毅力和热爱祖国的情怀，最后达成了一种对人民中国的国家认同。这种国家认同，就是那些互补的、对立的、融合的文化记忆所造就的互补性、矛盾性、融通性的国家认同。这种国家认同正是千千万万农民、手工业者、工商业者在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坚守的信念和信仰，也正是这种信念和信仰保证了广大人民群众在经历了生活困难时期、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等等劫难以后，仍然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精神支撑和心灵力量。今天，我们同样可以在互联网的互动过程中，在那些脱胎换骨人们的互补性、矛盾性、融合性的文化记忆的重温之中构建起对于中华民族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融通性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国族认同，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族群基础。

四、互联网语境中的立体性文化记忆与多重性国家认同

数字媒介技术建立起来的互联网的多媒体性在多种媒体的作用下也就形成了文化记忆的立体性、联觉性、逼真性。这种文化记忆的形象或者形

象世界，不再是单维度的，而是由文字、图像、声音等统一构成的多维度的立体形象世界；这种文化记忆的立体形象世界不是单独或者分别作用于人的某一种感觉器官，而是联合作用于人的五官感觉的整体，产生出一种综合了视觉、听觉、触觉、味觉、嗅觉的联觉印象；这样的文化记忆所建构的记忆形象世界，就是一个逼真的现实世界的形象世界，甚至是波德里亚所谓的“超真实”的“拟像”或“仿象”的虚拟世界。在多媒体互联网下，立体性、联觉性、逼真性的文化记忆，也形成了国家认同的多重性、情感性、理智性，似乎可以把国家认同的理性认知转化为文化记忆的感性显现形式，从而把国家认同转化为知（认知）、情（情感）、意（意志）高度统一的信念和信仰，进一步加强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

关于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文化记忆，就是这种互联网语境下的主要表现。不仅艺术纪录片《东方红》提供了一个联觉性的文化记忆，而且许多相关记忆都是具有立体性、联觉性、逼真性的。比如，【中国记忆】《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鲜为人知的诞生过程》，就是图文并茂，给人以立体感、联觉感、逼真感。还有张放、陈义凤的《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问世的真实背景及反对目标》放在了张放的微博中，也是图文并茂，给人们以立体性、联觉性、逼真性的文化记忆，从而可以促进多重性、情感性、理智性的国家认同感的产生。这个微博记载：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产生背景是毛泽东主席对当时的文艺界有两个指示：一个是1963年12月25日写在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编印的反映文艺界动向的简报《文艺情况汇报》上的。这一期的《文艺情况汇报》，报导了柯庆施在上海市抓革命故事会受到群众欢迎的情况，毛主席看了简报，对柯庆施抓故事会之举未作评价，却批写了一段令人震惊的文字：“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另一个是1963年6月27日，毛

泽东在《中央宣传部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报告》上所作的批示：“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根据毛泽东的第二个批示，已告一段落的文艺界整风重新开始。同前一阶段的整风不同，这一阶段的整风着重对文艺界的一批负责人进行检查和批判，因为当时毛泽东估计文艺部门的某些单位已经被资产阶级夺了权。1964年11月，毛泽东在听取一个汇报时说：整个文化部系统不在我们手里，究竟有多少在我们手里？百分之二十？百分之三十？或者是一半？还是大部不在我们手里？我看至少一半不在我们手里。整个文化部都垮了。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这次文艺界整风点名批判了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夏衍及主管文艺工作的田汉、阳翰笙、邵荃麟等人。整风结束后，中共中央改组了文化部领导班子，免去了齐燕铭、夏衍担任的文化部副部长职务。1964年7月上旬，周恩来去了一趟东南亚，和越南、老挝领导人讨论东南亚的形势和对美斗争的方针。7月12日，周恩来回到上海。在上海期间，他应陈毅邀请观看了大型歌舞《在毛泽东旗帜下高歌猛进》，感到‘很动心’。这时候周恩来有了一个想法，就是搞一台大型歌舞，反映中国革命的整个过程，一个是庆祝即将来临的建国15周年国庆节，一个是为文艺界鼓鼓士气。自‘大写十三年’出笼以后文艺界士气极为低落，周恩来虽然尽了力，但无法扭转乾坤。一台大型歌舞虽然不能解决什么根本问题，但对于振奋文艺界精神还是有作用的。当然对于‘大写十三年’的争论，这台反映中国革命全过程的歌舞也能起到一些引导的作用。周恩来回到北京后，立即请主管文学艺术的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召集文化部、总政文化部、北京市委宣传部、中国音协等部门进行研究。7月18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各部党组书记会议上说：“现在离国庆只有两个月了，有这么一个想法，就是最好在这个十五周年国庆，把我们革命的发展，从党的诞生起，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后来的‘五四’运动，到大革命，然后又到井冈山，举起了红旗，都贯穿着毛泽东思想，通过这个表演逐步地体现出来。”根据周恩来的意见，周扬立即组织有关方面负责人进行研究，“大家热烈拥

护，都愿接受这一任务”。7月24日，周扬致中宣部长陆定一转周恩来和彭真的报告中，对大歌舞的总体设想、规模、艺术表现和组织领导等提出具体意见。周恩来在百忙之中抽出专门时间认真审阅和修改了这份报告，并于7月30日在中南海西花厅约见周扬等有关方面负责人开会，决定大歌舞立即上马。大歌舞的名称经周恩来同意定为《东方红》。周恩来说：这个题目好，既精练又切题。8月1日，周恩来正式批准周扬的报告，并亲自拟定一个13人组成的领导小组，周扬为组长，梁必业、林默涵等任副组长，李一氓、齐燕铭、张致祥、陈亚丁、周巍峙等为组员。齐燕铭是周恩来特意加上去的，齐燕铭虽然已被批判并被免去文化部副部长，但周恩来觉得不能一棍子打死，要给他改过自新的机会。周恩来在周扬关于大型歌舞《东方红》问题的请示报告上批示：“全力争取搞好，并在国庆上演，如届时还搞不好，或彩排时有大缺点不及改正，就推迟上演。”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创作过程中，周恩来史无前例地全程参与，从总体构想到具体内容，从每一句歌词到每一段解说，都认真推敲仔细斟酌。这让大家感到意外，但更多的是鼓舞，因为在当时严酷的政治环境下，包括周扬在内的几乎所有文艺工作者都不知道哪个唱段哪句歌词会出问题。周恩来参加进来，至少可以保证大歌舞政治上的安全。由于时间太紧，创作人员经常工作到深夜，周恩来也常常陪伴他们到深夜。当年歌舞文学组的组长乔羽回忆说：那时，几乎每晚周总理都来，常常搞到深夜。我们每拟好一段稿子都要送给他看。他都非常认真仔细地修改，并很快退回来，从不耽搁。周总理经常拿着修改好的稿子问我：这个问题查到没有？毛主席著作中是怎么谈的？有时，我说没查到。他就说：我已经查到了，你看这样改行不行？望着他那疲倦但依然炯炯有神的眼睛，我真是感动极了。《东方红》通过歌舞的形式来再现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28年艰苦卓绝的奋斗历史，需要创作人员掌握大量的党史知识。周恩来常常对主创人员说：“我是跟着这段历史长大的，所以，我有感受，能帮助你们提些意见。”他不止一次给创作人员讲党的历史，谈自己的感受，告诉大家应该怎样正确认识和理解党的历史。他曾经有所暗示地讲到：中国革命取得成功“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有执行铁的纪律的党，就要有坚持革命、团结对敌的精神。只要这个基本的立场不变，即使犯错误也还要团结，即使领导一时有错误，还

要等待,逐步地改变。不能够因为有错误,造成党的分裂,使革命受损失,使对敌斗争瘫痪下来,那就对革命不利了”。周恩来不仅对《东方红》的政治和史实严格把关,对歌舞的艺术性要求也很高,他要求《东方红》要努力做到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要具有新鲜活泼、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要采用史诗的写法,既是粗线条的,又要很深刻,能打动入。在创作上要敢于打破框框、标新立异。要注意艺术风格、艺术手法的多样化。周恩来还反对使用平板、单调、说教式的东西,说这些东西不仅不能使人受到政治教育,也不能使人得到艺术享受。《东方红》在确定演出人员和选用哪些作品时曾发生很多宁“左”勿右的情况。这是因为毛泽东先后写下有关文艺的两个批示,对建国十五年来文艺工作作出错误的估计,导致一大批优秀文艺作品以及许多作家和演员受到错误的批判。在这样的气氛下,一些受到批判的作家如贺绿汀、田汉等人的作品被删除掉。周恩来得知后明确表示反对,说这样做是不对的。周恩来指示:在《东方红》中要选用大量民主革命时期的好作品,包括已经受到批判的著名音乐家贺绿汀的《游击队之歌》、著名戏剧家田汉作词的《义勇军进行曲》等。周恩来指出:对民主革命时期的作品,包括对三十年代的作品要一分为二。有些是人民群众批准了的东西,我们为什么不能采用?不能因人废言,以过改功。艺术家有失误,难道我们就没有失误?当时著名朝鲜族舞蹈家崔美善因正在受到批判,也被清理出演出人员队伍。周恩来发现后批评了有关人员,在周恩来的坚持下,舞蹈家崔美善终于获准登台演出。《东方红》里有一段最优美的朝鲜族舞蹈,就是崔美善表演的。当年参与《东方红》创作的作曲家周巍峙后来回忆说:“当时,文艺界的形势十分复杂。我是文化部党组成员、艺术局局长,也受到批判,正在做检查。总理还让我参与《东方红》的领导工作,说这些人是革命的,给我以及文艺界许多朋友一个亮相的机会。这里更深一层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在周恩来的直接指挥下,大型歌舞《东方红》终于在国庆节前完成了最后一次彩排。1964年10月2日,在灯火辉煌的人民大会堂,有3500多名全国优秀的音乐家、舞蹈家、歌唱家、播音员、主持人参加的大型歌舞《东方红》拉开帷幕。周恩来和刘少奇、董必武、朱德、邓小平等观看了演出。此后,连续上演十四场,场场爆满,掌声如潮。毛泽东也在10月6日

观看了演出,并在观看当中多次鼓掌向演员致意。10月16日下午,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董必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还亲切接见了参与《东方红》编创和演出的全体演职人员。在接见开始前,周恩来还宣布了一个重大消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东方红》演职人员可能并不知道,这颗原子弹的爆炸,也是周恩来亲自领导的。在短短两个月时间里创作出这样一台大型音乐歌舞,人员又是来自四面八方,有上海的也有北京的,有地方的也有部队的,有专业的演员也有业余的歌手,没有周总理的直接关心,是很难完成的。难怪陈毅向外国朋友介绍《东方红》时总是说:这台革命的歌舞“是由周总理任总导演的”,“周总理领导过中国革命,现在又导演革命的歌舞”。后来,为满足国内广大群众和国外许多朋友的要求,周恩来又不顾江青的极力阻挠,坚持将《东方红》成功地搬上银幕。由北京电影制片厂、八一电影制片厂和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联合摄制的彩色宽银幕影片《东方红》,很快在全国各地上映,城市乡村掀起了一股《东方红》热。电影《东方红》的上映和受到的好评,实际上宣布了柯庆施“大写十三年”口号的破产。^[13]

通过互联网了解了类似的一些关于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文化记忆信息,再来读一读黄卫星的《史诗〈东方红〉创作者口述史》等等类似的文化记忆的档案材料,再去重新欣赏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艺术纪录片电影,我们就可以形成关于《东方红》的立体性、联觉性、逼真性的文化记忆,从而重温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的生动、具体、鲜明的图像、音频、多媒体的伟大历程,更加直接地、感性和理性相统一地、知情意相统一地认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五十六个民族团结的大家庭。恰如《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鲜为人知的诞生过程》所说:“作为中国革命的第一部创世神话,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是20世纪60年代中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是在国家高层领导的直接干预和指挥下,以举国体制的动员与协调方式创作完成的,《东方红》首先是一项政治任务,其次才是艺术作品。作为高度政治化的产物,《东方红》承载着传播中国共产党人历史观与价值观的历史使命,因而其历史影响力远远超乎艺术与文化之外。”“《东方红》是一个时代的史诗与旋律,代表了一个时代的精神与意气,因而成为一个时代的经典。从《东方红》首演至今,整整四十五个年

头过去了,中国社会发生了沧桑巨变,思想文化也经历了痛苦的断裂与扬弃。沉舟侧畔,千帆已过;病树前头,万木争春。当理想回归现实,当激情回归理性,对《东方红》创作历史细节的探究,引发人们从更深的历史层面重新思考中国现代史上艺术所诠释的政治史和政治所干预下的艺术史。”^[14]因此,我们也可以看到,到现在为止,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政治影响要高于它的艺术价值,而它的政治影响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可以确立和加强人们对中国革命历史的认同,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认同。

总而言之,互联网语境下,丰富、多元、无边界的文化记忆,可以使得国家认同变得更加具有选择性、挑战性、复杂性;在互动性的互联网下,互补性、矛盾性、融合性的文化记忆,可以使得国家认同产生了互助性、对立性、融通性;在多媒体互联网下,立体性、联觉性、逼真性的文化记忆,可以形成国家认同的多重性、情感性、理智性。在全球化冲击主权边界和文化身份的“危机”下,我们应该积极规避互联网的消极性,充分发挥互联网的优势,在新中国文化记忆的土壤中,高度统一起全国人民的个人认同感和国家认同感,以增强现代国家意识,促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参考文献]

- [1] 宋念申. 发现东亚(十五) | “中华”失焦的“天下”[EB/OL]. 澎湃新闻, (2015-12-16)[2017-06-12].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409598_1.
- [2] 葛兆光. 许倬云《华夏论述——一个不断变化的复杂共同体》解[EB/OL]. 共识网, (2015-06-08)[2017-06-12].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thought/bi-anyan/20150608125547_all.html.
- [3] 刘刚, 李冬君. 文化的江山: 重读中国史(上册)[M].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9: 7.
- [4] 葛兆光. 寻找主轴与路标的文化史: 读《法国文化史》[J]. 读书, 2012(5): 72-85.
- [5] 百度知道. 怎样正确看待土地改革运动[DB/OL]. zhidao.baidu.com/question/3918354403.
- [6] 麦克法夸尔.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M]. 费正清, 编; 谢亮生, 杨品泉, 黄沫, 等译; 谢亮生, 校订.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
- [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第1册[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2: 406.
- [8] 胡绳. 中国共产党七十年[M].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1: 332.
- [9] 乘物游心. 对于“三大改造”的评价[EB/OL]. [2017-06-18]. <http://blog.sina.com.cn/u/1981909062>.
- [10] 吴琪. 上海1949~1956: 民族资本家的转折年代[J/OL]. 三联生活周刊, (2009-05-19) [2017-06-18]. <http://www.lifeweek.com.cn/2009/0519/24866.shtml>.
- [11] 网易新闻. 50年代生活记忆: 纯真时代的衣食住行(组图)[EB/OL]. (2009-08-27) [2017-06-18]. <http://history.news.163.com/09/0827/18/5HO9VUVO00011HJ4.html>.
- [12] 张应湘老师的博客. 请看阶级斗争年代民族资本家的小姐如何度过![EB/OL]. 新浪博客, (2012-07-04) [2017-06-19]. http://blog.sina.com.cn/s/blog_873a720301017kny.html.
- [13] 张放, 陈义凤. 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问世的真实背景及反对目标[EB/OL]. 新浪博客, (2015-09-15) [2017-06-19].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1c19620102wqp5.html.
- [14] 钟兆云. 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诞生的台前幕后[J]. 党史博采(纪实), 2004(5): 26-28.

(责任编辑 文 格)